

在今日中國對於憲政民主道路的探索中，當年右派的思想將提供滋養與啟示。

《反右數據庫》的出版是一件值得慶賀、令人鼓舞的大事。它的面世還推動了其他有關反右運動書籍

的出版——不論是正式、公開的出版還是非正式的、地下的出版。我們衷心希望，乘着這個勢頭，同仁們加緊努力，讓我們早日見到整個《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1949- 》的出版。

革命年代的重訪與超越

● 唐小兵



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已經漸行漸遠、革命者曾經標舉的理想主義氣質與批判精神愈來愈稀薄的今天，重訪革命年代如何可能？高華的《革命年代》直接地給「後革命產兒」提供了一種進入革命歷史與記憶的途徑。

高華：《革命年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

革命有兩種，一種以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與政治架構為基本目標，而在價值領域與社會文化領域依其自然秩序演化，比如美國革命與中

國的辛亥革命；而另一種則是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價值等領域全方位地顛覆固有的模式，而建構一種全新的、總體性的社會政治和文化世界模式，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都大體上屬於這一類。二十世紀初最早的憲政實踐失敗以後，中國社會就開始拋棄第一種模式，而迅速地擁抱總體性革命，這與林毓生所謂「以思想文化模式尋求根本解決」的思維模式形成共振（參見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希圖一勞永逸地解決傳統社會崩潰後的政治、文化與心靈秩序危機。共產主義革命屬於後一類革命。

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已經漸行漸遠、革命者曾經標舉的理想主義氣質與批判精神愈來愈稀薄的今天，重訪革命年代如何可能？高華的新著《革命年代》（引用只註頁碼）

直接地給「後革命產兒」提供了一種進入革命歷史與記憶的途徑。以筆者之見，這本論文集對一般讀者最有意義的是第三輯「革命詞語」和第四輯「時代湍流」，以及第一輯討論近代中國轉型的教訓和第五輯討論戰後國民黨失敗的文章，這些內容緊扣了上述第二種類型的「革命」。

在此書之前，高華已有《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身份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以及《在歷史的風陵渡口》等著作在香港出版，這些著作在史學界、知識界都引起了較大反響。可惜緣於各種體制性原因，這些著作不能合法地進入中國大陸讀者的知識視野（大多只能以地攤上的盜版書形式售賣）。然而，《革命年代》在中國大陸的出版打破了這一現狀。

在「合法」地閱讀着高華在艱難歲月裏寫下的這些論文時，筆者的內心不免掀起波瀾。「革命」不再僅僅是一個被拋棄或者崇拜的意識形態符號，它成為實實在在的政治實踐、話語操作與歷史記憶。〈「新人」的誕生〉一文，從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制度設計、思想改造與政治運作等層面展開，展現了「革命新人」是如何通過「和風細雨」和「疾風暴雨」兩種交替性上演的改造模式鍛煉出來的。通過寫「反省筆記」、填「小廣播調查表」、「審幹、反奸」、「脫褲子、割尾巴」等接二連三的政治操弄與思想改造，延安實現了高度的政治統一和思想統一，一個「大公無私」的高度一元化的共同體，在政治壓力與靈魂清洗的雙重

努力下逐漸浮出水面，私誼、故交、溫情、反思性和批判性都在被壓制之列。對黨員幹部和普通黨員的清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個人歷史與社會關係的反覆篩查等，混合在一起逐漸形成了中國革命特有的政治文化（頁177-206）。

這種政治文化在戰爭年代不可否認具有戰鬥的有效性，但這種黨文化的慣性，卻在建國後繼續生效，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高華精準地拿捏了「延安模式」消解黨員對於「審幹、反奸」等非正規方式（王實味等就是這種超常規方式的犧牲者）的正當性的疑慮：

這時毛澤東的崇高理想層面就發揮出解釋「正當性」的作用：為了革命的勝利，為了粉碎國民黨對邊區的特務破壞活動，組織上對黨員進行嚴格的審查是必須的，就是使用了「過火」的方法，其出發點也是好的，個人受些委屈不算甚麼，只要黨純潔了，黨鞏固了，個人蒙受再大的委屈都值得。政治手段的非正規性，由革命理想的崇高性給予解釋，而崇高的革命理想又需要通過強有力的政治方式來加以落實，這兩種方式的交替使用，最終使毛澤東的革命政治運作中的兩個層面實現了良性的對流和互補，促成了整風目標的完全實現。（頁206）

這就是革命的邏輯，它建立在毛澤東所象徵的黨組織永不犯錯的前提之上，問題是這個前提本身顯然違背常識。

〈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一文則更多地從革命者如何通過歷史敘述

高華呈現了毛澤東新話語的生產機制與生產過程，且精彩地描述了毛是如何通過定義的方式，來重新界定「知識」、「理論」、「人性」等基本概念，並使這些基本概念與延安時期的中國革命實際對接起來。

一個思想、政治和組織高度一元化的且主要依靠農民的政黨，如何對待不得不依賴的知識份子階層？高華對於左翼文化人與革命的關係以及他們心靈世界的敘述，讓我們可以從中管窺革命者邏輯與知識者邏輯的根本衝突。

與話語操作的方式來確立自身的合法性展開討論。延安初期主要有三種歷史話語，即瑞金時期的俄式話語、五四遺留的啟蒙話語，以及毛澤東正在創造的新話語。高華呈現了毛澤東新話語的生產機制與生產過程，且精彩地描述了毛是如何通過定義的方式，來重新界定「知識」、「理論」、「人性」等基本概念，並使這些基本概念與延安時期的中國革命實際對接起來（頁207-16）。（與此相對應的，則是高華在〈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一文裏所指出的蔣介石在語詞創造和歷史敘述上的貧乏，蔣一生都在道學家與基督教的術語裏無法自拔，這些話語對於他個人的道德自律或許不無意義，但與中國革命實際卻難以對接〔頁382-83〕。）對於俄式話語，毛主要通過對黨內宗派教條主義的壓制和清算以及各類機構名稱的更改來完成；而對於五四話語的覆蓋與轉換，則主要通過整風運動中對知識份子的改造來完成（頁207-16）。

毛澤東的新話語對知識份子影響巨大，知識份子的自我認同遭受毀滅性打擊，並形成一種原罪的集體無意識。工農不再是啟蒙的對象，而成為應該虛心學習的對象。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角色發生了倒轉。仔細想來，這其實也是毛在中共建黨以來一直面對的棘手問題，即中共自身的階級基礎（工農大眾，主要是農民）與核心組成（核心成員大多為知識份子出身）的衝突。他們是兩個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有着不同的價值觀、家庭背景、教育背

景、生活方式與政治意識等。從革命現實的有效運作而言，知識份子黨員必須使自己認同於普羅大眾，但從個性氣質和思維方式等抽象層面而言，知識份子黨員似乎與普羅大眾有着天然的疏離感乃至緊張感。毛的新話語的創造與實踐，成功地消除了二者之間的心理鴻溝，使革命實踐與革命話語完美地對接了起來。這也是在儒教中國崩潰之後，語詞與實際（即思想意識與社會現實愈來愈遙遠，知識份子的言說與實踐愈來愈背離等現象）愈來愈分離乃至對立的近代中國，第一次通過意識形態和革命暴力的雙重努力，將二者成功地扭合聚結在一起。

這種扭合聚結並不是將革命理想主義的烏托邦降格為平庸的現實世界，而是通過這一系列新語詞的操作，在中國的西北角——延安建構出一個充滿社會平等色彩和道德感召力的革命烏托邦。正如高華所言，延安蘊含了一個革命烏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兒有革命、激情、青春、戰鬥，還有集體主義、理想主義、斯巴達式的律己主義，人與人的關係建立在以革命為中心的平等的基礎上。著名作家丁玲就是在這種革命理想的召喚下，在中國革命最艱難的1936年到達延安（〈能不說丁玲？〉，頁257-69）。

作為後來者，我們不能否認當時一大批從沿海城市歷盡艱難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的革命真誠性。可這種真誠在被熱烈地歡迎的同時，也被習慣性地猜忌乃至懷疑。作為作家和知識份子的丁玲，在與延

安的新革命文化(以毛的新話語為中心)努力適應的同時,還是有點格格不入,於是才會寫下《在醫院中》、〈三八節有感〉等招致中央領導批評的小說和雜文。說到底,這還是那個老問題的新形式——一個思想、政治和組織高度一元化的且主要依靠農民的政黨,如何對待不得不依賴的知識份子(要從知識份子中培養黨員幹部)階層?高華對於左翼文化人與革命的關係以及左翼文化人的心靈世界的敘述,讓我們可以從中管窺革命者邏輯與知識者邏輯的根本衝突:

左翼知識份子傾向革命,這就和共產黨發生思想和組織的關聯;左翼知識份子還要「民主」和「個性解放」,這就和共產黨的「思想一致性」、集體主義發生矛盾;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最具革命性」的農民,革命自要滿足和代表他們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卻深受五四「改造國民性」等「啟蒙」思想的影響,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農民的所謂「落後」和「愚昧」;革命要前進,離不開思想和組織的高度一元化,更離不開革命的化身——革命領袖的思想和組織領導,左翼文化人卻喜歡高談「個性獨立」和「抽象的平等」,對敬仰和服膺革命領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碼的認識,更不會像樸實的陝北農民那樣去歡呼「大救星」。(頁259)

這就觸及到中國革命者的一個核心問題,即組織紀律性問題。紀律具有強制性與普遍性,紀律要求服從與遵守,且不容置疑和挑戰,

但紀律所要求的服從,其目的卻並不在於生產機械死板的消極接受者,它要求經受思想改造後的新人具有一種革命者的德性,將外在的組織紀律性完全內在化,昇華成為一種共產主義人格的自覺意識,從而提升一種充滿戰鬥意志和忠誠感的革命者的「主體性」。傳統社會的德性,強調的是個體自身的道德努力,是在鬆散的儒家世界裏借助於道德實踐與道德言說來完成的,德性造就人格,但這人格追尋卻容許存在自由度和差異性,所謂「為仁由己」,各有路徑,儒家基本上是反對公開展示德性的,認為這會使德性淪落為作偽和表演。而在延安鍛造組織紀律性的過程裏,德性必須成為政治空間裏可供審查和展覽的公開化品質,而審核的標準則掌握在黨組織那裏。

中國革命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既造就道德烏托邦,同時也在打造一個巨大的「利維坦」(Leviathan),它既有着超級迷人的道德浪漫主義(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格類型與解放全人類的大同理想等),同時也有着如霜雪般冰冷的現實邏輯與權力宰制。它沿襲着中國近代以來對新世界、新文化、新青年等一切所謂「新事物」的膜拜心理,在某種意義上,它確實迎合了在一個轉型時代青年人渴望反抗平庸、創造新生的心理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它救平了這種「延安模式」所造就的革命文化之前的種種困惑與焦慮,給大革命時代的人們提供了一種恐怖的心理穩定感與想像新世界的方式。革命文化因此擁有了巨大的感召力。

中國革命既造就道德烏托邦,同時也在打造一個巨大的「利維坦」。它沿襲近代以來對一切所謂「新事物」的膜拜心理,救平了「延安模式」所造就的革命文化之前的種種困惑與焦慮,給大革命時代的人們提供了一種恐怖的心理穩定感與想像新世界的方式。

高華面對的確實是一種特別艱難的言說困境，他在小心翼翼地尋找一種無限逼近歷史真相的敘述的分寸與價值判斷的適切性，所幸他畢竟算得上是革命文化的親歷者，對於這場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有着同情之理解與內觀之反省。

毛澤東確實成了這種烏托邦與權力邏輯緊密結合的革命文化的化身，他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也成功地應對了這雙重危機以及大眾心理需要。即使到了1966年的夏天，他在南方六月的瀟瀟雨聲中仍舊堅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因為他是在與人類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點——「私」作鬥爭。說到底，在他看來，劉少奇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圍下，一些共產黨人對發展生產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發揚革命精神的興趣，而在發展生產的背後，則是與資產階級精神相通約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適，追求物質，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這種「退化」作鬥爭。他相信，「公字當頭」的新社會是可以設計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讀《七律·有所思》〉，頁279-86）。這是一個革命者的慣性，這種慣性來源於過去歷史上的成功以及理性上的致命自負，卻給毛的後半生投下了難以磨滅的陰影，這陰影來自於延安時期的革命文化，來自於革命者黑暗與光明、神性與魔性交織的內心。

如何評價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如何評價中國革命最核心的領導者毛澤東一生的功過成敗？這永遠是一個富有爭議和充滿現實感的議題。簡單的告別或者擁抱也許都不明智。在閱讀高華這本歷史著作時，筆者時時感到他似乎行走在充滿危險和曖昧性的歷史河流之中。

從政治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延安模式」甚至中國革命無疑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的一大奇蹟，是

一次成功的革命，而延安的新人改造也確實有力和有效地推動了革命的勝利。而從人道主義甚至自由主義的視角來看，中國革命確實是以犧牲人的主體尊嚴和人格自主性，乃至人的自由等為代價而達成的，它摧毀了傳統的溫情與社群的歸屬感，卻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一種人人心悅誠服並且持久有效的道德體系與價值世界，更沒有建立起一個權力制衡的政治架構。高華的立場時常被這兩種評價標準撕扯。他在書中對極左文化的批判反映了這一點，而對於毛澤東在1949年前的革命實踐中所發揮作用的正面評價，也反映了其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客觀平實的態度。

歷史學是人學，而革命歷史中的人性又是如此複雜多變。高華面對的確實是一種特別艱難的言說困境（且不說學術之外的體制性因素的限制），他在小心翼翼地尋找一種無限逼近歷史真相的敘述的分寸與價值判斷的適切性（例如〈紅軍長征的歷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頁139-49〕一文就反映了這種揭示真相的努力），所幸他畢竟算得上是革命文化的親歷者，對於這場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有着同情之理解與內觀之反省。

〈後記〉裏的這段話很清晰地述說了高華與革命年代的關係以及對「學術」二字的理解：

說來還得感謝我所經歷的那個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動、大改組、大破壞，也意味着風捲殘月、摧枯拉朽，其間有血淚、痛苦、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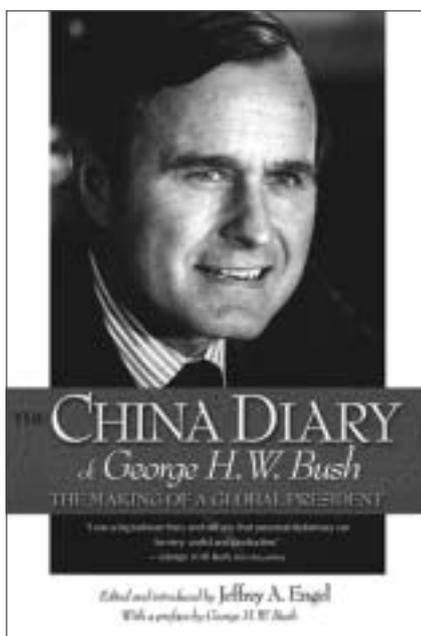
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長在這個年代，它給了我巨大的衝擊，也給了我動力和人生的坐標，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義的朋友們從此注定了不會為了功名利祿去做研究，也不會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樣去回望過去。於是，就在這喧嘩、實利主義的90年代，守着某種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陳詞濫

調的所謂「知識份子的責任」等，開始摸索着觀察、研究逝去的年代。（頁391）

這也正是我們這些後學重訪和超越革命年代的最值得借鑒的態度與途徑之一，而《革命年代》一書則更是直接給了我們一個重溫與反省中國革命的極佳機會。

老布什的中國日記

● 夏亞峰



Jeffrey A. Engel, ed., *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從1974年10月到1975年12月，老布什 (George H. W. Bush，以下簡稱布什) 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美國德克薩斯農業和機械大學 (Texas A & M University) 布什政府與公共服務學院 (Bush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 恩格爾 (Jeffrey A. Engel) 教授將布什在中國任職期間的日記整理、編輯成《布什的中國日記：一個有全球視野和影響力的總統的誕生》(*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 一書，於2008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引用只註頁碼)。恩格爾將全書根據時間順序分為八章，每章有一個主題，並配有導讀和詳細註釋。恩格爾為全書撰寫了前言和一篇詳細論述布什赴中國前的政治外交經歷，以及中國之行對其以後政治生涯影響的專題文章，布什親自

布什的中國日記只是為他個人留下記錄，沒打算公布於世。所以才能真實反映布什對中國領導人的看法、對美國政治與外交的個人見解、他本人的外交風格以及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外交官在中國北京的生活情況。